



天国里的风筝

□钟倩

“走，我带你出去逛逛，看看广场上有放风筝的吗？天暖和了，不能老在家呆着，你得出去多晒晒太阳，医生也让你晒太阳。”忘记从什么时候起，他变得婆婆妈妈起来。

“我知道你不愿见人，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？摊上了就得面对，你别那么倔，太倔了会吃亏。”见我不吭声，他穿好外套，拎着水壶，下楼推三轮车去了。

“你想吃什么就和我说，我下班给你买回来。吃好了，身体才能好。别给你妈说。”在广场上，我坐在三轮车上张望，他眯着眼睛眺望高空的蜈蚣风筝，一边和我说道。

这是我刚得病那会儿，父亲经常说的话，一晃眼，22年过去了。经常，我一觉醒来，看到父亲刚下夜班，带回一股湿湿的凉气，他脱下棉大衣，洗手准备吃早餐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怯怯问一句：“昨晚又疼了吗？”我装作没听见。围在桌前低头吸溜吸溜喝面条时，才想起来，他昨天夜里回来过一趟，问我有事吗。望着他熬得发红的眼圈，我的鼻头一酸。醒来时分，才发现，这是一场梦而已。

癸卯年清明，父亲离开我们1009天，马上三周年了，我却觉得一切恍若昨日。他的说话声、吃饭声、写字声，以及发脾气的样子，时不时在我眼前一遍遍地回放，仿佛在对我说：“你啊，还那么倔强，越来越像我了。”说着说着，他笑出声来。我多么想反驳他几句，却发现已经没有机会。

我对父亲的感情远远超过母亲。第一次品尝到父爱的味道，那是在童年时。有一次，在楼下空地上玩耍，有个比我年龄大且个子高出一头的男孩做游戏时伸手恐吓我，那一幕被下班回家的父亲看到了，他把男孩单独叫过来，声色俱厉地对他说：“她是女孩，你比她大，以后不能欺负她。如果再让我遇见，就不客气了。”从那以后，那个男孩远离我，其他男孩也不敢欺负我了。三十多年后，那个男孩成了两个女孩的父亲，工作换了好几份，后来跑去开出租车，或许他经常读我的文章，或许没有读过，但他一定记得那天中午，父亲在楼前电线杆子下面对他的一番忠告。三十多年后，我忆起这件小事，忽然懂得，父亲如海，咸咸的，后劲猛，在时光的淘洗下凝结成雪白的盐，初雪般闪亮，捧在手心里，我总担心它化得太快，把童年的气味一扫而光。

升入中学时，我有幸分到级部的好班。到了初二，学校在两个好班开设电脑课，为此专门开了家长会。回来后母亲阴着脸，没表态，我已经知道她的态度。班主任找我谈话，意思是这个机会难得。那段时间，我就像在同学面前矮了一大截，上课时像块木头，老是发呆。在外打工的父亲不知怎么听说了，把电话打到三楼邻居家，叫母亲去接。赶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天，母亲去学校交上了三千块钱，那摞钱沉甸甸的，用报纸里里外外包了好几层，弥漫着父亲的汗臭味。那摞钱换来了我上电脑课的机会，换来了青春期无尽的虚荣，却透支了父亲血泪耕耘的家庭。曾有个被退学的高三男生，与父母关系紧张，后来去了澳洲读书，他对我说，等我毕业工作了，把欠父母的钱一分不落地都

清明·怀念

生死两相隔，思念无尽时。每到清明时节，人们都会悼念逝者，追思故人。事实上，人们追念的不仅仅是家人、挚友，还是那些难以忘怀的情感。世间之情种种，既有“盼望黄泉路，重逢可有期”的无私亲情，也有“如彼翰林鸟，双栖一朝只”的刻骨爱情，更有“一世相交、终生不负”的真挚友情……清明虽有时，人们对于亲人、故友的思念，却不会因时间而停止。

□季福根

我的父亲季新业，生于1924年，卒于2022年，享年99岁，应了那句老话：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

父亲13岁那年，右腿生恶疮，因买不到青霉素落下残疾，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了。比残疾更加残酷的是，腿疾转化为骨髓炎，这种病的发病频率很高，有时一年犯几次，每当发病时都疼得大汗淋漓。此病没有特效药，只能硬扛。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，同一年我的奶奶撒手人寰，家里只剩下爷爷和父亲两人相依为命。爷爷看着可怜的残疾儿子，担心父亲受到继母的虐待而不肯续弦。

童年丧母和身体残疾的双重打击，没有让父亲沉沦，他告诉爷爷，要考师范，将来自食其力。他从旧书摊买了一本《四角号码字典》和一本《升学指南》，自学高级小学课程。经过两年独自寒窗苦读，终于圆了升学梦，考取了他梦寐以求的蓬莱联师，毕业后从教直到离休。一个农民的儿子，在没有老师辅导的情况下，通过自学考上师范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，不只在整个家族，就是在方圆几十里内也是首例。难以想象的是，他是怎样忍着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，一点一点地啃书本，弄懂那些繁杂的四则运算、盈亏问题及鸡兔同笼问题的。孟子说“生于忧患”，意思是忧愁和祸患能使人存发展，父亲的成功再次印证了孟子的话。

父亲工作认真，执教能力强，有管理才能，被提拔为小学校长。他担任校长期间，从来没有收受一分钱的贿赂，更没有贪污一分钱的公款，在三尺讲台默默耕耘30年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，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。

父亲不会投机取巧、趋炎附势，不请客送礼，不拉帮结伙，工资是校长中最低的。他拖着一条瘸腿，靠着微薄的薪水养活一家八口。家庭生活窘迫，捉襟见肘，寅吃卯粮，尤其是1959年到1961年间，我经常饿得睡不着觉，父亲从学校食堂打的馒头，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舍不得吃，总是带回家让我们吃，让我感受到无言的父爱。

父亲一生酷爱研究发明，在工作之余买来一本有关收音机的书籍反复研究，并买来各种元件，按照书中的插图焊接组装矿石收音机、电子管收音机、晶体管收音机，终于获得成功。离休后，他又利用对数计算尺发明了潮汐计算尺和干支年计算器。有人劝他申请国家专利，他说，我不为名利，纯属爱好，国家发给我的退休金已经够了。

父亲是一个认真的人，他认准的理儿九牛二虎也拉不回来。每当星期天回来，他便

一头扎进屋里，经常通宵达旦地忙。母亲为此埋怨他浪费火油，父亲说：“我不喝酒。”母亲说：“你不喝酒，喝火油。”细想起来，父亲得的心脑血管病与年轻时熬夜有很大关系。

父亲继承了我爷爷幽默诙谐的基因，走到哪里便把欢笑带到哪里。由于腿脚不方便，他走路摔跤是常有的事。有一次，他从芦洋小学办公楼二楼摔下来，师生们都惊慌失措地围拢过来，只见他疼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笑着对大家说：“这下好了，我的右腿能打弯了。”哪怕是到县里开会，也总是有人趁闲暇把他围起来，让他讲笑话。他讲笑话都是信手拈来，一开口便是活脱脱一段单口相声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农村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头一年，我家的一圈粪堆在门口被人偷走了，要知道农村有句谚语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”，没有粪就没有好收成。换作别人，说不定会骂大街甚至报警，他却一笑置之，说：“要是把我家的欠债掺在粪里就好了。”退休后的第一年，他和一个钓友一起去钓鱼。那天风大，鱼不咬钩，钓友只钓到一条，他却一条也没钓到。回到村口，有人问他钓了几条，他指着钓友告诉那人，比他少一条。

“文革”时期，父亲这个小学校长也成了“走资派”。很多小学校长被查出经济问题、作风问题，对清正廉洁、作风正派的父亲，造反派找不出一点瑕疵。但父亲在检讨书中写道：“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我工作之余，晚上办公之后研究收音机是不对的。”

中风偏瘫后，父亲不得不常年卧床，他对这种囚徒般失能的生存状态深恶痛绝，一度悲观失望。但后来受到保尔和霍金的影响，他坦然面对现实，把注意力转移到读书上。父亲生前喜欢读奥勒留的《沉思录》，两本《沉思录》都被他翻烂了。到了90岁高龄，他又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父亲一生不善交际，有几个和他合得来的老伙计也都先他而去。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除了家人和亲戚，来看望他的人越来越少。当我们问起有谁来过，他尴尬地说：“不才明主弃，久病故人疏。”人情如纸，世态炎凉，不要说他一个耄耋老人，连我们这些中老年人也感受到了。人的一生都是匆匆过客，有缘同行，缘分没了，一切归零。好在血浓于水，他的身边有他的子子孙孙几十人，这就够了。

父亲走了，他要去另一个世界了。他走得从容，仿佛奔赴另一个工作岗位；他走得又很匆忙，急着要去陪伴我那同样平凡而伟大的母亲。

别了，父亲！